

区域动态（撒哈拉以南非洲）

目录

专题聚焦	2
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态度	2
各国动态	14

专题聚焦

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态度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民族主义发展历程简介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起源于殖民时期，受到殖民政权多方面压迫的驱动。资源剥夺、政治压迫和土地剥夺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差距和社会不平等，激发了本地人民对殖民统治的强烈不满，文化压迫和种族隔离政策进一步削弱了本土文化和身份的自主性。不公的政策引发了非洲人民对独立和自主的强烈愿望，激起了广泛的反殖民运动，并进一步形成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族主义浪潮。

非洲从 19 世纪逐渐沦为西方殖民地时起，其民族主义思想就已开始萌发。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民族主义最早产生于西非沿海地区。这里从奴隶贸易时期就与西方发生了日益频繁的交往，并最早产生了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和思想影响的当地民族知识分子。此外，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也与西方列强人为划定殖民地范围存在联系，是一种争取非洲殖民地自治和独立的诉求。“领土”概念在其中意义重大，并在后续发展成为旨在建立和维护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主义，亦可称之为非洲的“国家民族主义”。非洲民族主义思想在遭受西方殖民侵略和种族歧视的过程中产生，并随着殖民统治的建立和推进而逐渐成型并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斗争。

除了压迫性的殖民经历本身之外，传教教会、两次世界大战、泛非主义意识形态等因素也共同催化助长了非洲民族主义的高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范围内的政治氛围发生变化，民族自决原则开始受到重视，这为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契机。在战争和十月革命，特别是美洲黑人领导的泛非主义运动的影响下，西非等地开始出现民族觉醒和民族主义政党，并明确提出了关于“人民自决权”与“地方自治”的政治要求和主张。有的政党还将自己直接命名为“民族民主”党。¹

¹ 如 1922 年成立的“尼日利亚民族民主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形势下，非洲民族主义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一大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开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此时期，非洲各殖民地普遍建立了民族主义政党，开展政党政治活动，并领导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指导这一伟大实践的，正是空前繁荣和活跃的非洲民族主义思潮，特别是以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塞古·杜尔（Ahmed Sékou Touré）等人为代表的较为系统、鲜明的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其基本要点包括“不妥协地反对一切殖民政策”、争取民族独立和“彻底解放”、采取“积极行动的”斗争策略。从战后到60年代初，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都“设法用和平方式争取民族解放”，并在英、法殖民地取得了很大成功。在此阶段，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催生出多个独立国家和政权的同时，还涌现出各种组织，其中包括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KANU）、推动刚果民主共和国独立的刚果国民运动党（MNC）等执政党或政治势力。

在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全球竞争也影响了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美国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一方面部分支持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运动，另一方面也担心共产主义的蔓延，并因此继续支持前殖民宗主国在非洲的利益，或者支持一些被认为是“独裁者”领导。在此前提下，美国对一些非洲国家提供了政治和经济援助，同时也介入了一部分内部冲突，试图影响其局势的发展。从美国在非洲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具体角色来看，美国政府对特定非洲国家的支持和援助政策，都反应出其在冷战战略中如何看待非洲的地缘政治重要性。

总的来说，二战后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问题上的复杂态度体现了多方面的考虑——冷战因素、国内选民支持、对种族问题的敏感性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美国在非洲问题上的政策，使其表现出一种矛盾而复杂的立场。这一时期的美国一方面支持民族独立问题各国自决，但另一方面由于冷战的考虑，不得不在维系与欧洲殖民宗主国的关系中保持一定的平衡。这种情况突显了国际政治中各种利益和价值观的交织，展现了当时美国外交决策中的多维度考量。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具体案例分析这一矛盾，并突显其中的多方关系和相互博弈。

二、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复杂态度

（一）美国对戴高乐时期的法属非洲政策的立场

在戴高乐时期，美国对法国在非洲的殖民政策采取了一种矛盾而复杂的立场。二战后，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潮中，法属非洲殖民地纷纷独立。但是，这种独立只存在于名义上，法国在割舍不去的“非洲情结”的支配下，仍然保持着在非洲国家的全方位影响和“法非特殊关系”。法国试图重建和巩固其在非洲的殖民统治，特别是在阿尔及利亚和其他法属非洲地区，希望通过维护殖民体系以确保对资源和市场的控制。二战后期，戴高乐曾通过一系列措施，争取到非洲和太平洋大片法属领地的支持，为他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提供了强大的人力和财力资源。维持“法非特殊关系”是殖民地独立后法非关系的最大特点，主要体现为：法国绕过正常的外交渠道，通过不透明的私人关系网来处理对非事务。例如，戴高乐在总统府内另行组建了“非洲事务处”（Cellule africaine），由该机构全面负责对非联系，为总统本人制定非洲政策出谋划策。然而，这种特殊关系在法非双方都引发了大量质疑和诟病，即战后法国不是积极寻求和非洲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而是和非洲首脑合谋继续控制非洲，通过暗箱操作、地下交易等方式为本国攫取利益，其本质仍然是殖民主义的，是“新殖民主义”。

二战后的国际氛围中，自决权成为一种重要的价值观。由于与自身宪章中所奉行的民主原则相一致，美国总体上支持各国争取独立和自决的权利。例如，美国曾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倡导反殖民主义，并支持殖民地的独立运动。1946年1月，美国代表团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中共和党人的领军人物是纽约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杜勒斯在总体政治立场上是一个保守派，但在殖民主义问题上是一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他在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上对美国代表团发表讲话时说“我们应该考虑要求联合国大会宣布所有拥有殖民地的国家接受托管，而不仅仅是强制权力。整个附属地区的真正问题是一种肤色的人统治另一种肤色的人。”

然而，在二战刚结束后的几年里，美国在欧洲对非洲的殖民主义问题上面临着两大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华盛顿希望尽一切可能使西欧在战后加速恢复过来。这一目标催生了马歇尔计划以及后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另一方面，当时的杜鲁门政府面临着世界共产主义崛起对西方安全的威胁。美国认为苏联等共产党政权向殖民地人民宣传欧洲在美帝国主义的帮助下正剥削他

们，永远不会给予他们独立。因此，美国驻西欧的外交官们警告说，共产主义有可能将反殖民主义的信息加以利用。但从冷战联盟与法国的地缘政治地位来看，面对法国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地缘政治地位，美国在戴高乐时期的非洲政策上采取着灵活的政策，表现为一种谨慎的默许态度。

在以反共主义为核心的冷战策略这一战略框架下，维护欧洲盟友稳定成为美国的首要任务。1950 年初，美国国务院内部对非洲政策的意见分歧引发了一场官方政策辩论，最终于 1950 年 4 月发表了一份题为“非洲未来”的官方政策声明。该文件强调了非洲的发展对欧洲殖民国家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实力的重要性，而欧洲殖民国家是美国抵御共产主义在西欧蔓延的盟友。此外，文件还预测：鉴于非洲大陆蕴藏着巨大的自然资源财富，非洲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只会与日俱增，并指出从殖民主义中独立出来的新一代非洲民族主义者，实际上对苏联及其欧洲共产主义朋友的动机相当怀疑。由此可见，美国实际是对欧洲盟友的“新殖民主义”行为进行辩护。面对法国对非洲国家依然保持的“宗主国”姿态，尽管美国一直支持各国的自决权，但为了维护与法国的冷战联盟，美国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法国恢复在非殖民统治的尝试，避免与法国发生直接冲突，并体现出为对抗苏联而维护欧洲盟友的冷战策略。这种权衡旨在确保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稳定，防止苏联在非洲地区扩大影响。此外，美国对权力和霸权的追求还受到地缘战略和经济问题的影响，其对法属非洲政策的模糊立场也是为了保护自身在非洲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同时是对过去殖民帝国的一种回应。

（二）美国对比利时属刚果的立场

20 世纪 60 年代初，比利时属刚果独立运动蓬勃发展，作为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比利时属刚果的独立运动旨在摆脱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和自决权。美国在这一时期采取了不同于对待法非关系的立场，更倾向于支持刚果独立。这一立场既是出自对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也是源于对苏联在非洲扩张的担忧。

回顾比属刚果独立的历史，尽管该国的独立运动在当时取得了显著成功，使刚果成为非洲独立浪潮中获得独立的国家之一，然而整个过程却十分波折。与英国和法国不同，比利时并没有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就开始为殖民地的独立做

准备。比利时是在最后一刻才决定同意刚果独立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少。1955年，比属刚果是世界上铜和铀的主要生产国，也是仅有的两个钴生产国之一。考虑到刚果巨大矿产资源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比利时政府希望尽可能延长在刚果的统治，并不急于让刚果独立。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比利时国内政治向左翼政党倾斜，左翼政党认为在其他欧洲国家解放殖民地的同时，比利时不应继续充当殖民国家。于是在1958年，比利时决定将刚果的独立时间设定为1960年。为在1959年举行选举，刚果迅速进行了准备工作，然而由于殖民时期的教育缺失，刚果行政人员、公务员和企业管理者没有得到任何培训。比利时政府的想法是，刚果人民还不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因此在政治独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会欣然接受比利时的管理。然而，新独立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在独立后不久就成为了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国家，1960年6月，比属刚果在独立后数日后就陷入了混乱。

美国对比属刚果独立运动的支持首先是出于宣扬自身意识形态以及遏制苏联在非扩张的战略考虑。这种复杂的政策观点在美国政府关于对非洲新独立国家政策的辩论中得到了体现。1957年3月，时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就曾表示对非自治民族独立的概念表示支持，然而，他对未来独立的非洲国家能否保持独立感到担忧。他说：“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如何让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不被共产主义接管？如果非洲输给了自由世界，我们就会有大麻烦。”

出于对苏联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的担忧，美国认为支持非洲国家的独立运动可以遏制苏联在非洲的影响力扩展。1960年7月和8月间，苏联外交官支持反比利时、反西方的刚果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的行为引起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注意。由于恐惧苏联趁乱控制整个刚果，艾森豪威尔向美国驻比利时的北约总司令发出命令，要求准备部队介入刚果以恢复秩序。然而，在这一指令得以执行之前，时任副总统尼克松提醒艾森豪威尔，他早先的政策决定是在必要时依靠联合国参与非洲的稳定行动。因此，艾森豪威尔改变了通过北约进行干预的观点，转而命令美国提出联合国维和行动建议，供联合国安理会审议。1960年7月14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纽约召开会议，通过了第143号决议。该决议包含两项决定：比利时必须从刚果撤军，联合国秘书长有权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联合国向刚果部署了2万名军

事人员，根据艾森豪威尔的政策决定，部署到刚果的军事部队中没有欧洲或美国人员。尽管如此，美国还是为联合国在比属刚果的军事行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只有美国拥有军事空运能力，可以将军事部队及其装备运进运出刚果。因此，在联合国行动的四年中，美国空运司令部一直忙于运送军事部队。除军事部署外，联合国公务员也被调入刚果接替即将离任的比利时管理人员，并培训刚果人接替他们的工作。联合国在刚果的行动从1960年持续到1964年，其最终结果使刚果保持了领土完整，并为前比利时殖民地实现真正自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这一时期，美国积极支持非洲的独立运动，将其视为反抗殖民统治和争取自由的正义事业，以宣扬自身所奉行的“自由、民主和反殖民主义”的价值观。美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表示对刚果的支持，与刚果领导人建立联系，并在一些场合中公开表达对刚果独立的赞同。例如在1960年9月，艾森豪威尔在他最后一次向联合国大会发表年度讲话时表示应不干涉非洲内政，国际社会应协助非洲国家确保其安全并继续向刚果提供紧急援助，联合国应为非洲教育和经济发展提供援助。此外，维护自身利益也是美国愿意在某种程度上支持刚果独立的原因之一。刚果地处非洲中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支持刚果的独立有助于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美国对比利时属刚果的支持，不仅是对刚果独立运动的一次具体表态，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其他非洲国家看到美国对刚果的支持，更有信心推动自己的独立运动，这对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相比于对戴高乐时期法属非洲政策的模糊立场，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对比属刚果的支持体现了其对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积极态度，同时也反映了美国对共产主义势力在非洲扩张的担忧。这一政策既是出于对民族独立正义事业的支持和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是冷战背景下地缘政治冲突的产物，对全球范围内的非洲独立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简析为何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民族主义运动态度复杂

在20世纪中期尤其是在冷战时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美国政府对待该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时，面临着外部和内部因素的交织，这使其态度显得复杂而多变。总体上，美国对非洲独立的态度十分矛盾。从

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大西洋宪章》开始，美国就公开主张大多数殖民地实行自治或独立。在政策理念上，历届美国政府都保持反殖民立场，即使他们对独立的非洲国家不感兴趣。随后的美国政府依然保持罗斯福反殖民政策的惯性，他们倾向于认为，应该与独立国家而非殖民帝国建立伙伴关系，并应减少欧洲的不稳定。然而，在实际行动上美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采取了这些观点仍是疑问，没有一届美国政府积极支持二战后席卷非洲的许多独立运动。其外部原因包括冷战联盟制约以及地缘政治利益，内部原因涉及选民意愿与政治稳定、种族问题与民意考量、以及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等因素。

由于早期美国对非洲殖民历史相对较少的参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在这一地区较为有限，对非政策向来处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边缘地带。在二战结束冷战爆发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势力范围，非洲才进入美国的关注视野。美国对非洲殖民地的政策起源较晚，可以追溯到柏林会议和非洲争夺战时期。一些学者将美国对非外交政策划为不同时期。例如，拉穆哈拉（Mashudu Godfrey Ramuhala）确定了三个时期：“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以及“自9/11以来的时期。”从柏林会议到一战期间，美国对非洲事务的介入相对较少，主要集中在商业和经济利益上，同时在争夺殖民地和资源方面与欧洲列强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立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美国地位开始崛起，它在意识形态和军事上与主要殖民国家结盟，美国没有动力反对殖民主义。美国对非洲各国的民族独立采取着实用主义的态度，那些不符合美国军事利益、经济利益或者对抗共产主义战略诉求的国家，通常被美国采取“善意忽视”的不干预态度。

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外政策深受意识形态和盟友关系的制约，需要在支持自决权和支持盟友的殖民统治之间进行权衡，其与西方盟友的联盟对其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国家在非洲拥有殖民地，尽管美国理论上支持自决权，但在实际中，为了维系冷战联盟并对抗苏联，美国不得不在一些情况下违背这一原则。冷战期间苏联对非洲外交的重视与支持，帮助推动了非洲裔美国人待遇的变化。因此，如果说冷战中美国认为非洲国家应该独立，那么在当时，美非关系的改善更多地是一种苏联遏制战略，是支持自由、独立的非洲人民管理自己的民主国家。对美国来说，非洲的角色应该是一个更愿意对抗苏联的伙伴。美国对非洲的战略兴趣包含几方面原因：首先是遏制苏联的影响力并防止其在各地扩张，特别是

在非洲新兴国家。其次，是出于地缘政治利益，维持非洲作为战略工业原材料特别是矿物的来源。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大国而言具有战略重要性。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关注这些地缘政治利益，希望维持区域稳定以保护其在非洲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再次是靠近中东的非洲地区具有军事战略意义，美国希望通过在非洲建立军事基地以寻求战略优势和合作。上述原因使得美国在支持民族主义运动和维护当地既有秩序稳定之间十分矛盾。

二战后初期，美国并未对非洲地区的外交政策投入过多重视。当时，前殖民地宗主国在这些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中仍有很大影响力，而美国的关切主要围绕着苏联及其在欧洲、远东和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虽然杜鲁门政府时期对非洲开始展现出一些关注，但纯粹是从遏制苏联的战略角度来看待非洲，即将非洲作为防止共产主义扩张的方案，以及东西方冲突中的代理战场。其对非洲的外交政策总体上具有边缘化和事后考虑的性质。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似乎对非洲国家的独立缺乏准备，再到政府对非洲外交政策目标的不一致，美国似乎在遏制苏联的目标之外缺乏连贯性的对非外交政策。此外，20 世纪 60 年代国内种族政策的失败也为美国带来诸多挑战：鉴于非裔美国人缺乏民权的现状，新独立的、黑人占多数的非洲国家向美国施压或利用其外交影响力抨击美国在人权概念上的虚伪，也为民权拥护者提供了批评美国的合法平台。

在一些学者看来，美国对非洲的外交政策往往显得杂乱无章——美国在有机会塑造非洲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并培养与非洲大陆的友好关系时，会参与到非洲事务中，其余时候则选择置身事外。法国、比利时等国家在非洲的殖民统治与美国的冷战联盟密切相关，这一背景加剧了美国对民族主义运动的复杂态度。例如，美国的非洲事务局成立于 1958 年，当时非洲国家刚刚获得独立，美国对非洲的关注几乎是在“比利时、英国、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影响力不断下降，苏联及其盟国的外交活动日益增多”的推动下进行，其自身缺乏塑造对非战略的主动性。

值得注意的是，黑人社群的觉醒和对非洲独立的支持也对美国政策产生了影响。民权运动的兴起使得美国政府必须在支持欧洲殖民统治和支持非洲独立的态度之间进行平衡。非洲独立运动对非裔美国人产生的影响是形成美国对非洲独立的矛盾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一直以来奉行自由、民主和反殖民主义的价值

观。在冷战时期，这些价值观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尽管外部因素可能迫使美国在一些情况下偏离这些价值观，但它们仍然是美国对非洲民族主义运动态度的重要参考。在去殖民化时代之前，美国的“民主”和“非殖民”形象曾在非洲人眼中赢得了极大的尊重。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林肯大学的尼日利亚国家领导人纳姆迪·阿齐基韦（Benjamin Nnamdi Azikiwe）曾钦佩美国是“宗教和政治自由的象征。”与此同时，非洲独立也激励着美国不同阶层的民众。新独立的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在访问联合国时，受到纽约街头排队的一万多名非洲裔美国人的欢迎，从他的胜利中他们看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希望。对非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也与美国国内的种族问题密切相关。黑人社群对非洲的关注与同情，是美国政府在制定对非政策时必需考虑到的因素。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对非政策并未被美国放置在外交政策的重要位置。在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之前，美国对非洲民族独立的政策态度相对保守，相比之下更注重维持与欧洲盟友的关系，对非洲国家的独立运动持谨慎立场，其关注的出发点主要是为防止社会主义势力在非洲地区的扩张。肯尼迪当选总统后美国对非洲民族独立的政策态度有所积极转变。总体上，肯尼迪政府支持非洲独立，并通过提供援助和发展项目，试图在冷战背景下争取非洲国家的支持，同时促进非洲的社会经济发展，加强了美国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然而在肯尼迪政府结束后，这些变化并没有持续下去，美国似乎又回到了以前的“骑墙”派对非政策。肯尼迪在上任之前曾向非洲派出一个特别工作组分析非洲大陆的形势。特别工作组建议彻底改变美国对非洲的态度，应该“放弃因与殖民列强的联系而产生的传统骑墙观，转而支持非洲民族主义”。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更多非洲国家独立，尼克松政府一位官员的说法继续说明了冷战期间美国对非洲的政策。1969年至1974年间担任非洲事务局助理国务卿的戴维·纽瑟姆（David Newsome）写道，尼克松政府“决心纠正其所认为的前几届民主党政府的‘黑人倾斜’政策。新共和党团队基本上对非洲漠不关心”。

在美国政策制定过程中，选民的意愿和对外政策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民主选举等因素影响着尼克松政府对非洲的态度，当纽瑟姆向其中一个团队建议尼克松应该就非洲政策发表演讲时，他的回答是：“为什么应该这样做？我们只得到了8%的黑人选票。”因此，尼克松政府不仅在《民权法案》签署后立即面临严重阻

力，而且似乎又回到了美国对非洲独立的忽视立场，这涉及到美国对非洲的外交政策。纽瑟姆表示：“人们对非洲本身的关注较少，而更多地关注冷战中苏联、中国和古巴对非洲解放运动，特别是南部非洲的解放运动的援助”，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危险的共产主义渗透和对美国利益的威胁。

总体而言，对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立场来回反复，是美国在二战后非洲殖民末期对非政策的总体基调。在联合国，美国不断在口头上支持非洲自决，但其选票却不断投给欧洲殖民国家。相反，苏联似乎更支持非洲新兴国家的独立。考虑到苏联在华约国家的行动，包括1953年在东德和1956年在匈牙利的行动，这种对非洲国家的支持具有鲜明的战略考量。

从美国的具体行动来看，美国在一些情况下通过外交途径支持非洲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与他们建立联系，并在国际舞台上表达对其的支持。例如，美国支持了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等领导人。此外，在权衡外交和军事干预层面，美国在一些国家采取了谨慎的外交手段，并未直接干预内部冲突。这是为了在支持自决权的同时，不过多介入局势，以避免引发更大的地区不稳定。同时，美国在一些情况下通过提供经济援助来支持非洲国家，帮助它们在独立后进行国家建设。这既符合自由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维护稳定的手段。总体而言，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民族主义运动的态度复杂而多变，既受到外部地缘政治和冷战联盟的制约，又受到内部选民意愿、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美国在非洲民族主义问题上的政策导向，使其在支持自决权和维护外交关系之间进行复杂的权衡。

资料来源

- [1] Bahram M. Rajaei and Mark J. Miller (eds.), *National Security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 [2] Claudia E. Anyaso (ed.), *Fifty Years of U.S. Africa Policy: Reflections of Assistant Secretaries for African Affairs and U.S. Embassy Officials*. Bloomington, IN: Xlibris, 2011.
- [3] Conor Cruise O'Brien, *To Katanga and Back: A UN Case History*. London: Hutchinson, 1962.
- [4]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une 19, 1950.
- [5] Didier Gondola, *The History of Congo*.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2002.
- [6] Herman J Cohen, *US Policy Toward Africa: Eight Decades of Realpolitik*.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9.
- [7] James Kedzie Penfield, "African Nationalism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Social Science*, Vol. 36, No. 4, 1961, pp. 221–30.
- [8] James P. Hubbar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British Colonial Rule in Africa, 1941-1968*. Jefferson: McFarland & Company, 2011.
- [9] Jay Dee, 2019. The Cold War in Independent Africa. <https://central.edu/writing-anthology/2019/07/02/the-cold-war-in-independent-africa/>.
- [10] Jurgen Ruland, Theodor Hanf, and Eva Manske (eds.),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 the Third World: A Post-Cold War Assessment*.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 [11] Michael L. Krenn (ed.), *The African American Voice in U.S.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8.
- [12] Miguel B. Jerónimo and António C. Pinto (eds.) *The Ends of European Colonial Empires: Cases and Comparis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 [13]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Memorandum from the Representative at the Trusteeship Council (Sears) to the Representative at the United Nations (Lodge), New York, January 29, 1959. <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8-60v14/d11>.
- [14] Peter J. Schraeder,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toward Africa: Incrementalism, Crisis, and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5] Stephen M. Magu, *Great Powers and U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Africa*.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 [16] Vincent B. Khapoya, *The African Experiences*. Routledge, 2012.
- [17] Wilson Center, "Nationalism and Decolonization in Africa during the Cold War," <https://www.wilsoncenter.org/event/nationalism-and-decolonization-africa-during-the-cold-war>.
- [18] Yves Gounin, *La France en Afrique: Le Combat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 Bruxelles : de Boeck, 2009.
- [19] 曹德明. 从历史文化的视角看法国与非洲的特殊关系[J]. 国际观察, 2010(01): 29-34.
- [20] 刘伟才. 非洲民族独立国家的涌现[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2(Z1): 100-101.

-
- [21] 刘伟才. 非洲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发展[J]. 中国投资(中英文), 2021(ZA): 98-99.
- [22] 彭姝祎. 从戴高乐到马克龙:法国的非洲政策变化轨迹与内在逻辑[J]. 西亚非洲, 2019(02): 85-110.
- [23] 唐大盾. 非洲民族主义的历史由来和发展[J]. 西亚非洲, 1998(05): 18-25.

各国动态

安哥拉

布林肯结束非洲四国之访，致力于持续的安全和经济伙伴关系

1月24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美国将继续与非洲伙伴密切接触，希望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持续存在的冲突。在与安哥拉总统若昂·洛伦索（Joao Lourenco）举行的会谈中，布林肯讨论了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冲突不断的东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的具体方法。这些讨论在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紧张局势升级的背景下进行，其中刚果和卢旺达军队据称发动了数起跨境袭击。

此次访问是布林肯非洲四国之访的一部分，布林肯在结束此次访问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非常赞赏洛伦索总统为缓和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所做的持续努力。我们相信，罗安达进程与内罗毕进程相结合，是持久和平的最佳希望。安哥拉受到各方信任，洛伦索总统的领导力对于取得突破至关重要。”布林肯在会见安哥拉外长泰特·安东尼奥（Tete Antonio）时讨论了美安双边关系，强调与罗安达在重大铁路基础设施项目和外层空间探索方面不断加强合作。他表示，这些项目是美国一代人以来对非洲大陆铁路的最大投资，也是安哥拉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合作伙伴关系的核心。

——编译自1月25日美国之音

加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加纳仍陷债务困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名为“2023年第四条磋商”的加纳工作人员报告中透露，加纳仍处于债务困境，其目前的状况被评估为不可持续。IMF表示，“在债务重组完成之前，所附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DSA）继续显示严重且长期违反标准阈值的情况”。2023年10月6日，IMF的一个团队与加纳政府举行了会议，讨论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扩展信贷安排（ECF）计划下政策安排。

IMF补充说，宏观经济框架是债务维持分析的基础，工作人员基于基金组织支持的旨在恢复中期宏观经济稳定和债务可持续性计划所设想的宏观经济轨迹。在Covid-19大流行、全球金融状况收紧和俄乌冲突之后，加纳的财政和对外状况显著恶化。基金组织表示，这些外部冲击，加上先前存在的财政和债务脆弱性，推高了公共债务和外债。为此，加纳在2021年底失去了国际市场准入，2022年宏观经济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加纳遭受了巨大损失。IMF指出，加纳当局一直在实施全面的债务重组，旨在通过将债务存量和流量比率降至各自的阈值，在LIC-DSF框架下实现债务可持续性和适度的债务困境风险。

——编译自1月26日MyJoyOnline

南非

南非欢迎国际法院关于加沙战争的命令

南非欢迎国际法院（ICJ）于 1 月 26 日发布的命令，要求以色列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和惩罚在加沙战争中直接煽动种族灭绝的行为。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表示：“今天标志着国际法治的决定性胜利，也是巴勒斯坦人民寻求正义的里程碑。”南非本月早些时候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采取紧急措施制止导致超过 26000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的战争。南非政府指责以色列在哈马斯武装分子于 10 月 7 日攻入以色列并杀害 1200 人并绑架 240 多人后开始发动攻势，该攻势由国家主导。以色列试图驳回此案。

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部门表示，法院认定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似乎是种族灭绝，并表示以色列必须在此基础上采取临时措施。声明称，联合国安理会现在将收到法院命令的正式通知。“不能允许个别国家行使否决权来阻碍国际正义，尤其是考虑到以色列违反《种族灭绝公约》的行为导致加沙局势日益恶化。”该部门表示，临时措施对以色列具有直接约束力，以色列必须根据法院的命令和《灭绝种族罪公约》本身，停止所有看似种族灭绝的行为，例如南非在其申请和要求中提出的行为指示临时措施。声明称，以色列没有任何可信依据继续声称其军事行动完全符合包括《灭绝种族罪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编译自 1 月 26 日 *Sunday Times*

肯尼亚

肯尼亚法院称警察不能部署到海地执行任务

肯尼亚一家法院于 1 月 26 日驳回了一项向海地派遣警察执行联合国批准任务的计划，这令人对这一旨在解决该加勒比国家帮派暴力问题的前景产生了怀疑。2023 年 10 月，海地反对党对政府派遣 1000 名警察解决海地日益加深的危机的决定提出质疑。去年，海地帮派暴力导致近 5000 人死亡，约 20 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联合国安理会批准该任务后，肯尼亚曾希望最快本月在海地派出军官，但不久后法院下令暂停部署。高等法院法官查查·姆维塔（Chacha Mwita）裁定，根据肯尼亚法律，当局只有在与东道国政府达成“互惠安排”的情况下才能在外部署官员。姆维塔说：“任何国家机关或国家官员为推动这一决定而采取的任何进一步行动或步骤都违反宪法和法律，因此是违宪、非法和无效的。”

2022 年，由于帮派暴力激增，海地首次请求帮助，但找不到愿意领导安全任务的国家。联合国发言人斯蒂芬·杜雅里克（Stephane Dujarric）对记者表示：“对安理会授权的多国部队的需求仍然非常高。”“我们需要紧急行动和紧急资金，我们希望成员国继续尽自己的一

份力量，然后再做一些。”许多政府一直对支持总理阿里尔·亨利（Ariel Henry）的非民选政府和干预一个此前一直饱受侵犯人权问题困扰的国家持谨慎态度。去年 7 月，肯尼亚终于挺身而出，表示这样做是为了声援兄弟国家。巴哈马随后派遣了 150 人，牙买加、安提瓜和巴布达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编译自 1 月 27 日 *Reuters*

编译：张丁

审核：撒哈拉以南非洲组